

回憶在聯合國初期的光輝歲月

夏晉麟著
鍾行憲譯

一九五七年，在我退休一年後，我在已故的摯友江季平先生敦促下，出任「中國與聯合國」一書的編輯。這本書是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贊助下出版的叢刊之一。若非江先生的大力協助和不屈不撓，該項基金贊助出版的一系列刊物，很可能會將中國遺漏了。我寫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此，因為本文完全是我參與早年聯合國工作的個人報告。我雖耽心有些人或許會認為我在自吹自擂，但我深信我的同胞願望曉得在那短短的幾年裡，中國在聯合國曾佔有一席榮譽的地位，並高踞世界的領導地位。我還相信，如果我現在不提這段往事，不久之後恐將無人記得這段歷史。事實上，第一代的中國代表，近幾年來幾乎凋零殆盡。而我還有資格及能力執筆記載這段特殊時期的歷史，是因為我是我國代表團中青年青力富的團員之一，並曾參加聯合國創立初期所成立之所有重要的委員會。我曾為中國常駐聯合國

代表團代理團長，同時是常任安全理事會的副代表。可說我曾代表中國參加各種政治組織，同時也曾深入聯合國的行政問題。

我和聯合國的關係實際上是從一九四四年開始。用艾奇遜 (Dean Acheson) 的話說：「我目睹了聯合國的創立。這段關係，從頓巴敦橡樹園會議或一九四四年秋在華盛頓舉行會議起草聯合國憲章草案，準備在舊金山大會中提出時開始，直到中華民國、美國和英國代表的會議被稱為第二階段的頓巴敦橡樹園會議時止。我都是以中國代表團團長顧維鈞博士的顧問兼新聞官的身份與會。美國代表團是由國務卿史退了紐斯 (Edward R. Stettinius) 率領，英國代表團是以哈里法克斯 (Viscount Halifax) 居首。在此次會議中我認識了若干英國和美國的外交官。史退了紐斯先生待我非常友善，他曾邀請我們許多人訪問他在維吉尼亞所設的農場。因此當他於一九四六年春以安理會美國首席代表身分來到紐約

時，他待我如同老友。

此外，我曾參加一九四五年五月舉行的舊金山會議，五十個國家聚集商討了六週，最後於六月二十六日簽訂聯合國憲章。四個發起國之一的中國代表宋子文先生是這項世界最重要文獻第一個簽署者，這是中國國際關係史上一個里程碑，因為在近代史上，中國首次被稱為一個大國，此事遠超出了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最醉心的理想；在整整三十年之前，他曾矢志追求中國之自由及與世界各國平等之地位。我仍記得中國在國際聯盟時代的印象，當時我國被列為三等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國獲得新的評價而被尊重，中國代表也能昂首闊步於大會議廳的走廊而毫無自卑感。對中國來說，那是歷史上最光榮的時刻。

中國派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參加舊金山會議，並分配到最大的旅館之一——馬克·霍金斯大飯店 (The Mark Hopkins) 作為駐節之所。

宋子文部長是代表團團長，顧維鈞大使是他的副手。我任代表團新聞組組長；還有由紐約、芝加哥、舊金山和蒙特利爾辦事處調來的大批幕僚。

我覺得我在頓巴敦橡樹園和舊金山的工作非常有趣，但我並不十分重視這些指派的工作，總認為它與我往後的事業無甚關連，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歐洲和美洲擔任各種政府指派的工作已有八年之久，很盼望在戰後能早日返國繼續我在一九三七年撤下的生活。

一九四六年三月初，我接到重慶拍來的電報，事前沒有任何通知。但這通電報不僅使我打消返回中國的計劃，還改變了我一生事業的方向。電報是外交部次長劉鐸代表郭泰祺博士（他甫被任命為中國第一位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拍來的。電報中說郭先生將及時抵達紐約參加定於三月二十六日在紐約召開的安理會第一次會議，並要我為將屆的安理會會議做一切必要的準備工作，包括設立秘書處和租賃辦公室。當時我在洛克斐勒中心已設立有寬大的辦公室和一批能幹的職員，這個要求不成問題。郭先生認為我當然不會拒絕他的要求，並會竭盡所能從旁協助。他大約是在三月中旬抵達紐約，隨行的還有幾位私人助理。簡單扼要地，他雖未曾說明但已假定我為他在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工作的主要助手。我不能確定他是否明瞭我當時還沒有解除我在美國擔任宣傳部主要代表和中國新聞社南、北美洲辦事處主任所負的責任。

有些人或許會問：何以郭先生會如此信賴我並讓我負如此重大的責任？

郭先生和我彼此已結識多年。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到一九四〇年夏季，我到倫敦擔任中國戰時的宣傳部代表期間，他是我國駐英大使，我們的友誼更深了。他歡迎我奉派在倫敦任職，而且待我懇懇親切。我可以逕自走進他的辦公室，而他只要是單獨時就會邀我與他共進午餐。

我想他很瞭解我使他與英國工黨接近的努力。在那幾年中，英國的反對黨反而比保守黨更同情中國英勇抵抗日本的侵略。透過英國友人的關係，我認識了巴恩斯（Barnes）、亞歷山大（Alexander）和克里普斯（Cripps）等許多著名的工黨領袖，他們都是前任工黨內閣的閣員。幾年後成為財政大臣的克里普斯爵士對我特別友善，有一次還在下院設宴款待我。那一回，他要我帶幾位旅居倫敦的中國領袖與工黨領袖們會晤。有一天，克里普斯向我提出一個驚人的建議；他說他可以在工黨國會議員的協助下，代表合作運動籌措五十萬到一百萬英鎊，援助自由中國的中國工業合作社（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我就教於郭大使，他聽了這個消息自然高興。我到克里普斯爵士的法律事務所和他晤談了幾次，討論這個計劃。他的構想聽來非常簡單。由於英國合作社有兩百萬名會員，他打算要求該社的領袖們發布一道通告，要求每一名會員捐助或購買一張十先令的債券，協助中國境內的合作社運動。他說，不出數日，他們就能籌出一筆鉅款讓中國工業合作社購買所需要的任何

機器、工具和原料。這將大為促進中國的戰時經濟。可是很不幸在我即將簽署這項契約的數日之前，盟國敦克爾克大撤退發生了。克里普斯遺憾地通知我說，在英國的命運懸而未決之際，他和他的友人無法進行這個計劃。在此事件之後，克里普斯爵士仍然關切中國的遭遇，一年後他還曾到重慶訪問過一次。

在他逗留重慶期間，他曾前往莫斯科作短期的訪問，並曾邀請舍弟晉熊同行。

我在這兩年中的工作，必然是讓郭大使留下了些許印象。因為在一年後，當他被任命為外交部部長時，他最先採取的行動之一是打電報到華盛頓，擬邀我出任政務次長，並要求我隨他長途旅行，由舊金山橫渡太平洋並穿越新開闢的滇緬公路。他的計劃未能實現，因為蔣委員長認為美國比重慶更需要我。郭部長遺憾地讓我返回美國，因為他希望我能為他安排與美國及英國駐重慶重要官員和外交人士之間，作友善而有益的接觸。

在此後五年間，郭先生似乎並未忘記我或稍減他對我的好感。在他退休之後突然奉召再度出任駐聯合國安理會常任代表的高職時，他立刻想到了我，並希望我能對他的新職有所幫助。在我推測他必曾與外交部長王世杰討論此事，而得到王部長的同意。他指派我為他的首席顧問，並要我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初設立的任何委員會。國運和個人的命運一樣有盛有衰。中國突然

一躍而為戰後世界的強國之一。是近代史上上一樁空前性的戲劇性的事件。自一八四二年以來，中國在這一百年中是每戰必敗。北平曾兩度淪陷於外國侵略者手中。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飽受屈辱。一九三一年的瀋陽事件暴露了國際聯盟的無能。一九三七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已準備征服並佔領整個中國。中華民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做了一個歷史性的決定：中國將不再徒然求助於國際聯盟，也不再企求任何第三國的協助；而堅決獨力抵抗強橫的侵略者到底。運用「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中國軍隊得以在中國廣大的領土上牽制一百萬日軍。當美國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參戰時，資源殆盡的中國已獲得大量的輸血。中國人民懷著新的勇氣和希望，得以繼續奮鬥爭取自由。中國確實能够在敵人最後投降之前，承擔這沈重的負荷。

中國在一旦之間躍升為世界強國之一，是盟國感激她忠於共同目的的一份禮物，也是她最大犧牲的報償。

我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安全理事會在紐約舉行第一次會議那天，進入世界最偉大的國際組織。由於英文字母順序的巧合，中國代表郭泰祺代表榮幸地主持了這項歷史性的會議。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此一最重要的事件上，世界各地的每一家報紙都在第一版刊登了開幕會議的照片。僅此一舉，中國就由默默無聞一變而為萬眾矚目的對象。

安理會受理的第一個案件是伊朗政府控訴蘇俄政府在一九四二年三國條約規定，期滿後仍然

駐軍伊朗。郭代表是經驗老到的外交官，他莊嚴而技巧地主持會議。我想我當他的副代表將是輕鬆愉快的。誰知事實並非如此。

郭代表突然奉召前往巴黎協助王世杰部長參加外交部長會議，決定義大利及其他歐洲戰敗國的地位問題。結果，在安全理事會及原子能委員會代表中國的重任，就落到我纖弱的雙肩上。在郭代表離去的長時間內，安理會必須處理許多重要的問題，諸如希臘案件（或巴爾幹問題）、敘利亞及黎巴嫩案件、新會員國入會的問題、軍事參謀團的報告，另外還有原子能委員會。這些全是緊急的事情，我也竭盡所能肩負起我的重大責任。

三

美國政府最優先考慮原子能委員會的工作，並且任命已故的巴洛克先生 (Bernard Baruch) 為該委員會美國代表。巴洛克先生在他三十歲以前即已致富，並且終其餘生獻身於公益。他曾擔任五位總統的顧問。他以其特有的專注和嚴謹態度着手於賦予他的使命。當該委員會集會時，他堅持首先發言，並立即向該委員會提出美國建議管制原子能以確使其應用於和平用途、禁止國防軍備採用原子武器並藉檢查及其他方式設法有效防備的提案。郭代表在同一會議中發表聲明，大體上支持此一提案。在他啓程前往巴黎後，我接替他在該委員會的職位，並數度發表演說盡我所能支持巴洛克先生。巴洛克先生似乎已決心爭取中國全心全意的支持。現舉個例說明巴洛克先

生的嚴謹態度。有個星期天下午，他光臨寒舍堅邀內人和我到他的俱樂部進餐。其後我們兩度應邀參加他的生日宴會，在席間我們會晤了許多他的朋友和仰慕者。原子能委員會未能發揮作用必定使他大失所望，因為他極想做些事以便留芳百世。該委員會不能發揮作用是因為蘇俄拒絕了美國堅持有效檢查的提案。

在我擔任代理代表期間，軍事參謀團的報告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了。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參謀總長在一九四六年整個春季一直開會，設法執行聯合國憲章第四十七條的規定。他們的問題是如何使每一個常任理事國提供聯合國部隊交由安全理事會指揮。蘇俄代表堅持五國必須平均提供，槍砲口徑須相同、艦隻載重量須相同、飛機性能須相同。該委員會大多數認為蘇俄此項提案太過硬性，因而無法接受。還有這些人員、艦隻和飛機分派地區的問題，也未能達成協議。最後，軍事參謀團決定將此問題推給安全理事會去處理。安理會舉行了三次會議也無法打破僵局。由於中國是軍事參謀團的會員國之一，我當然要對這一報告發表一些詳細的評論。我主要的顧問是中國的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和空軍中將毛邦初，他們是軍事參謀團的中國代表。我這篇演說登在聯合國秘書處的刊物上，被視為安理會的典範演說。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幫着冷藏了這份報告。雖然何應欽將軍從未向我說明中國的軍事實力，我明白蘇俄的這個計劃不是戰後的中國能够參加的，它也耗費不貲。我同時覺得蘇俄是有意使中國受窘。蘇俄代表明白表示，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都

已表示可否的態度。蘇俄這種沒有妥協餘地的立場反使我更容易處理。因為我不必去攻擊蘇俄此一計劃了。我說我國政府無法接受這個計劃是因為它太過硬性而且無法執行。實際上蘇俄此一計劃在安理會中未曾得到任何國家的支持。蘇俄的提案未曾付諸表決，此事也無限期擱置下來。在理論上，軍事參謀團確實仍然存在並且定期開會，但它是個毫無意義的機構。

傳統武器委員會是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七年二月成立的，旨在執行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在四月九日的第五次會議中，它設立了一個附屬委員會，由五個常任理事國組成，擬訂該委員會工作計劃草案的使命，並指定中國代表為該附屬委員會的主席。在該附屬委員會即將開會的那天早晨，我接到一個電話，說是郭代表微感不適並囑我代他出席這項會議。在我抵達會議室時，我和該委員會秘書威廉斯 (Brigadier Williams) 簡單的談了一下。在他看來，我是郭代表的代理人，就應該擔任主席。當我宣布開會時，該附屬委員會另外四個會員國的代表——他們是美國、英國、蘇俄和法國代表團的團長——有點驚奇但沒說話。會議順利地進行。在聯合國史上，這是五個常任理事國組成一個委員會公開集會罕有的例子。

身為駐安理會的代理代表，我曾應奧斯汀先生 (Warren Austin) 之邀參加了一次五個常任理事國的私人午餐會，就行使否決權一事交換

意見。再者，我曾出席五個常任理事國的秘密會議，和他們的顧問設法對組成新的以色列國問題達成協議。但這些會議是私下召開和非正式的，因為席間沒有主席者，也沒有紀錄。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主持的那次會議獨特之點是：它是由中國副代表主持，四國大使出席的公開會議。傳統武器委員會有意推選中國代表擔任主席是因為在東西雙方歧見開始加深的情況下，中國仍然保持中立，這或許是一個合理的解釋。此一事件也包含一項寓意：雖然有外交禮節這樣的東西，一個外交官所代表的國家及其國家的國際地位實在是他的權威的根本基礎。

由於我主要的責任是在安全理事會，我政府時常分派給我其他的工作。例如，在吳經熊博士不能來美出席人權委員會時，我曾被要求代表中國參加核子人權委員會。我們知道美國政府極重視該委員會。當我抵達韓特大學 (Hunter College) 出席該委員會的開幕會議時，秘書長的一位代表出來接我，他對我說，大家已同意推舉羅斯福夫人 (Mrs. Franklin D. Roosevelt) 擔任該委員會主席，要我為提名人而由知名的法國人賈桑 (M. Rene Cassin) 為附議人。賈桑後來由於他在人權方面的工作贏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是羅斯福夫人第一次擔任公職，而美國國務院確信她是領導及加速推動該委員會工作的恰當人選。美國國務院也認為代表地球上最大國家的中國代表適為提名人，羅斯福夫人顯然滿意於這個職位，並且由衷感激中國的願意合作，因而把我當成朋友。這個職位的確給了她展示她完美

人格和卓越能力的機會。透過她的技巧、熱誠和長久的任期，羅斯福夫人使這樁偉大的工作有了成功的結果。在這些初期的集會中，除了擔任主席之外，羅斯福夫人還自告奮勇擔任通譯，回想起來實在有趣。為了方便那些不懂法語的人，她會把法語譯成英語。她曾邀請內人和我到海德公園 (Hyde Park) 渡假，另外一次是到她在華盛頓廣場的公寓參加她那出名的炒蛋晚餐會。幾個月之後我把職務移交給張彭春博士。

我曾是聯合國總部設計委員會的委員。那是一段極有價值的經驗，因而使我也和該委員會主席奧斯汀大使結交為友。美國國會慨然預付美金兩萬萬元充作建築費用，該委員會因而無庸擔心財務問題。洛克斐勒家族捐贈了東河地區的土地。我贊成興建一幢四十層樓的大廈而非建築師建議的三十八層樓建築。五年之後，日漸擴大的秘書處充分使用了這幢四十層的大樓。

五

我必須稍微提及我參加聯合國麻醉品及危險藥物委員會的經歷。施恩明博士離開代表團加入聯合國秘書處後，我同意遞補他的空缺。該委員會是由麻醉藥品方面的專家組成的，自我參加該委員會後聯合國麻醉藥品局局長史丹尼斯博士 (Dr. Stennes) 對我別有用心。他邀我到他的辦公室，並且把一份解決世界麻醉藥品問題的計劃攤在我面前，暗示我（代表一個既不產鴉片也不製造麻醉藥品的國家）將是提出一個相當野心勃勃的解決辦法的適當人選。這個提案將使產

鴉片的國家，像土耳其和伊朗，限制他們的年產量到適足以供應全世界需要量的地步。生鴉片將交給像法國及荷蘭等製造國家，將其製成供醫學上使用的藥品。生鴉片和製成的麻醉藥品的總量將由一個中央機構登記和管制，這個機構有一天將發展成爲聯合國的一個機構。我獲得美國和英國代表的支持，最後該委員會採納了這項決議。史丹尼斯博士和我都因初步的成功而欣慰。那年十二月原定於安卡拉（土耳其）舉行一項會議討論此一計劃的細節問題，一般了解我將應邀主持這項會議。在中國內戰的情勢開始不利於中國國民黨時，我得到明顯的暗示：有些代表團或許會反對我擔任此一會議的主席。我決定不出席在安卡拉召開的會議。幾個月之後，我獲知安卡拉會議中起了嚴重的爭論。他們設法在巴黎舉行第二次會議也歸於失敗。我在想，倘若我政府仍在大陸，倘若我曾出席安卡拉和巴黎舉行的兩次會議，我或許能夠挽救這個偉大的計劃的一部分。果真如此的話，那將是對抗麻醉藥品漫長而悲慘的歷史上一項劃時代的成就。一九五三年，我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第一屆聯合國鴉片會議，並被推選爲大會的副主席。這也許是過遲體認到我在麻醉藥品委員會工作的證明。

現在我要談談我在聯合國活動的另一個範圍。它們和此一世界組織的行政問題有關。在一九四六年在紐約舉行的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上，郭泰祺代表和我被分派到第五委員會。安理會常任代表和其副代表被派出席聯合國行政及預算問題的委員會是有點異乎尋常的。根據聯合國憲章的

規定，大會議程的項目分由六個永久委員會處理。第一委員會處理政治問題；第二委員會，經濟；第三，社會及人道主義；第四，託管問題；第五，行政及預算；第六，法律。稍後增加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接管了負擔過重的第一委員會一部分的工作。郭代表也許不滿意這項分配。他從未出席第五委員會，並囑我完全負責該委員會的工作。

出我意料的是，我發現在該委員會中結識很多像挪威的韓布洛博士（Dr. Hambro，他的公子當選爲一九七〇年聯合國大會主席）和希臘大使艾尼德斯（Th. Agnides，曾任國際聯盟副秘書長）等老前輩是令人興奮的。我也以能有處理一個國際組織的許多行政問題的新經驗而很感愉快。該委員會的委員都器重我並待我以禮，不久我就成爲一個舉足輕重的委員，並且繼續留在該委員會十年之久，直到一九五六年我退休爲止。在一九四六年的會期中，我和當時英國外務部的副國務員楊格（Kenneth Younger）及未來的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非常接近。我還記得史蒂文生先生找我幫忙的一個特殊例子。根據聯合國總部協議，秘書處人員可免繳個人所得稅。但美國國會拒絕讓聯合國聘用的美國公民享有這個特權。這對美國代表團構成一項難題。爲了避免同等級職但不同國籍的人員之間有任何的不平等，第五委員會必須採取一些特殊的調整措施。史蒂文生先生還有一個難題，那就是蘇俄代表團抨擊美國國會採取的立場。他認爲，由於中國在當時的地位，我

的請求或可認爲是大公無私的。我主動的支持，的確獲得了該委員會的贊助。由於蘇俄並未提出任何鄭重的反對，美國此一提案被採納了。

六

一九四六年的聯合國大會，經由第五委員會的推薦賜給我兩大榮譽。第一個榮譽是該委員會推選我爲行政及預算問題委員會的九個委員之一，雖則我從未企求那個職位，當時我也不了解它的重要性。它是一個大會委員會而且一年到頭都在開會。中國代表團已經提名一人爲該委員會的委員候選人。但英國、美國和南非聯邦的代表團認爲我應做中國的官方候選人，並且提出我的名字列爲第二個中國籍候選人。聯合國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例如在選舉國際法庭法官時，任何代表團可以自由提名任何其他代表團的任何人爲候選人。我的名字在即將舉行表決在投票一小時前。英國代表團的馬修爵士（Sir William Mathew）走到我桌旁高聲直說（使我的助理和秘書們都聽得）：照第五委員會一般意見，我比中國的官方候選人更適宜做行政及預算問題委員會的委員，如果，我拒絕的話，中國將喪失其在委員會的任何席位。對我來說，那真是最尷尬的場面。由於我無法離開我的座位，我要我的助理人員向顧維鈞代表及郭泰祺代表請示。這兩位高級代表都找不到。在此同時，我們的官方候選人聽到馬修爵士和我的談話後，表示他要退出競選而支持我。我因而當選做了五年的此一極有威望的委員會的委員，在主席艾尼德斯缺席時，我主

持了幾次會議，並且深以獲得該委員會主要委員：希臘的艾尼德斯先生、法國的賈楠先生 (Mr. Andre Ganem)、英國的馬修爵士和美國的預算局副局長史東先生 (Mr. Donald Stone)、以及後來接他的賀爾先生 (Mr. William Hall，現在是美國的大使) 的信賴和友誼為榮。

另一項出人意表的榮譽是我當選為聯合國大會第五及第六委員會的聯合委員會主席。它是由十二位委員組成的，六個來自第五委員會，六個來自第六委員會。此一聯合委員會負責審核聯合國秘書處的組織、草擬職員規程、決定秘書長及其職員和國際法庭法官的薪俸以及訂定恩俸制度的工作。在聯合委員會集會時，口頭表決推選我擔任主席。我立刻推辭此種重任並解說我對國際的文職工作問題毫無經驗。英國和南非的代表解釋道，聯合委員會的委員們都不缺乏經驗，該委員會所需要的是一個大公無私的主席引導會議進行下去。他們希望說的是，讓一個古老的東方文化和一個具有新成就的國家的代表擔任主席將是有益而令人精神振奮的。他們確實是要向我的國家致敬。

我珍視這些年月的記憶。我認為親眼目睹聯合國誕生是一項罕有的特權。我認為能夠結識我們這個時代最傑出的資深外交官並和他們一道工作，是我個人的榮幸。能够密切瞭解目前仍然威脅世界和平的重大國際問題，是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經驗。最重要的是，我由衷地感激有幸成為中國在世界最偉大的組織中最光輝的時候代表她的少數人士之一。

王雲五博士主編

涵芬樓秘笈

涵芬樓舊藏唐、宋、元、明、清各代精鈔精刊，世所罕見。其中哲學、金石、文史、傳記各類均有，且多屬孤本，甚具研究與參考價值。

精裝一〇冊 售價一、〇〇〇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政劃撥帳號第一六五號